

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何以可能？

——基于中国场景的理论重构与机制耦合

文 \ 方钰雯 \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本文植根中国独特的治理情境，聚焦跨域治理难题和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困境，系统探索城市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变革路径。通过创构“政治势能—制度弹性—社会整合”三维分析框架，提出“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原创性概念，强调依托“政党—国家—社会”三维互动结构，以执政党政治势能为核心驱动，基于制度弹性机制的动态调适与社会整合机制的基础支撑，构建新型跨域治理范式。研究发现，政治势能通过“储备—传导—落地”机制驱动治理效能转化，制度弹性以“吸收层—调适层—转化层”嵌套结构平衡政策刚性与地方创新，社会整合则依托价值共契、利益共享与技术赋能铸就协同共治生态。以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实例为鉴，论证机制耦合对破解行政区划壁垒、推动治理范式转型的关键作用，以期为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理论体系构建提供学理支撑，并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关键词：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势能；机制耦合

DOI: 10.3969/j.issn.1674-7739.2026.02.002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具有开拓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重新塑造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制度性支撑，且二者之间达成目标与路径的辩证统一。城市作为现代化要素密集的空间载体，其治理效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皆有深远影响：城市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验田”和“前沿阵地”，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多层目标体系的“集成实践场”。

观照中国城市化之演进，可析三重实践图景。其一，在空间层面，城市成为落实共同富裕（城乡融合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城市建设）、科技创新（智慧城市治理）等经国大略的关键治理单元；其二，制度层面，“枫桥经验”的更新转化与“接诉即办”的机制突破并未局限在基层治理范畴，而是实现了“制度化”，持续为国家治理体系贡献地方性知识；

其三，在治理层面，城市治理成效犹如明镜，直接映照国家治理能力之精微，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因此，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深刻影响。

亨廷顿关于“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动荡”的观点，^[1]于中国城市治理新局中得验。值此数智勃兴、经济转型的变革时代，虽机遇涌现，然城市治理体系亦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观其治理空间，在区域一体化趋势下，都市圈、城市群迅速扩张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跨行政区划的治理真空，导致权责分散，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察其治理结构，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加剧了信任的流失、权威的分散和资源的碎片化；究其治理议题，流域治理之类公共事务外溢效应显著，逐渐超越单一行政区，演变为跨区域、跨部门、跨主体的跨域公共事务形态，^[2]凸显合作治理困境。以上现象表明，既有的城市治理体系已难承时变之重，因而亟需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治理共

团体，以主动应对挑战。

既有研究在协商治理、参与式治理等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索，这些努力为中国城市跨域治理研究提供了宝贵启示。但置于中国治理场景，现有理论解释显示出三重适配困境：首先，包括“跨域治理”在内的西方治理理论蕴含的“平等契约”合作内核与我国一统体制存在制度抵牾，其多中心治理愿景和中国严格的政府等级扞格难通，模糊治理边界的主张亦遭遇刚性行政壁垒的约束；其次，现有的制度性集体行动研究往往囿于府际博弈与利益竞合的传统分析框架，^[3]对于政治动员新机制及其组织化实现路径欠缺解释力度；此外，共同体理论尚未搭建起中国“党政统合”制度优势向城市治理效能转化之津梁，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研究亦面临社会原子化趋势下微观机制的设计与运行难题。此等学理藩篱，于实践层面得到具象体现。例如，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环境监测数据壁垒与交通网络“断头路”现象折射出要素流动的制度化梗阻；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政务通”创新过程中暴露的责任共担机制阙如，显示出利益协调机制的制度供给缺口。

理论与实践之双重困局，引发根本之问：在“治理共同体”成为高频政策话语的今天，如何突破概念移植路径依赖，实现西方治理理论的在地化转译与中国化重构，铸就具有理论自觉的本土化治理知识体系？如何在实践机制层面驱动适应中国场景的治理共同体的生成？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回应，不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更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循“理论重构—概念提出—机制耦合”之思辨幽径，探寻“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4]理论创新与研究价值在三个层面得到体现：首先，熔西方经典治理理论与共同体理论于华夏洪炉，进行本土化理论调适，构建契合中国治理情境的分析框架；其次，首创“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概念，为全球治理智识图谱增添华夏注脚；最后，揭示“政治势能驱动—制度弹性调适—社会整合支

撑”的机制耦合规律，此中机杼是对数智时代城市治理新体系的生成和发展的回应。在实践层面，本文撷取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等国家战略区域之典型案例，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和决策指引。

二、理论重构：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调适

中国场景下的跨域治理实践，既需要突破对传统共同体的浪漫主义想象，更亟待超越西方治理理论的解释窠臼。这种理论重构本质上是一场双重突围：既要直面西方理论范式与中国治理场景的深层张力，更需在政党主导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建构本土化解释框架。本文通过“张力识别—调适路径—框架生成”的三阶递进，试图破解中国城市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理论密码。

（一）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张力

传统共同体理论在解释中国治理实践时所面临的解释力式微之困并非偶然。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观照，西方经典学说在解释政治势能何以突破科层壁垒和行政边界，跨域合作缘何能在行政发包制框架下实现弹性运作等问题上显得力有不逮。此等理论断裂，酿就治理逻辑、价值取向、动力机制三重结构性张力：

其一，治理逻辑的范式冲突。西方治理范式以“社会中心主义”为基，倾向于多元主体组织网络；而中国则以“政党中心主义”为枢，凭党委统筹实现治理权威再生产。^[5]中国是“以党领政”之制，遇全局性要务需以“党的全面领导”突破官僚制的程序僵化和形式主义顽疾，^[6]借“高位推动”化解跨域事务多属性的矛盾。

其二，价值取向的本源悖谬。个体理性假设与群众路线传统形成价值断裂。西方代议制民主以原子化个人为基本单元，其制度设计肇端于洛克自然权利学说与密尔自由原则，形成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序列。此等价值预设与普特南社会资本理论形成学理互构——强调横向公民网络对民主效能的基础作用，却难以解

释中国通过“万名干部下基层”等纵向组织化动员实现社会整合的政治逻辑。新冠疫情防控中展现的“党员下沉”之制尤彰此道——个体的工具理性让位于集体主义价值共识，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此中机理，深植于群众路线传统对儒家“家国同构”伦理的现代转化，亦寓于社会主义制度“个人—集体”辩证统一之政治哲学。

其三，动力机制的本质差异。西方契约型协作依赖制度性承诺，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势能驱动经“中央深改委顶层设计—部际联席会议传导—督查考核落地”之链式反应，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压力传导体系。中央环保督察尤彰此道：作为政治势能理论的典型实践，其通过整合跨层级、跨领域、跨部门的各种资源，形成集中统一意志，以较快速度推动公共政策的落地执行，^[7]形成了“高位推动—整体性治理—效能转化”的治理共同体。

治理逻辑的抵牾、价值取向的矛盾以及动力机制的差异共构理论调适之“问题域”，亟待植根中国治理现代化土壤，开垦新的理论增长点。

（二）中国场景的理论调适维度

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治理场景时遭遇“水土不服”问题，这需要基于中国治理实践进行本土化调适，可依以下三个维度重新勾勒理论坐标系。

1. 政治势能：制度优势的效能转化

作为脱胎于政策话语“高位推动”的中国本土政治学术话语，“政治势能”经由贺东航等学者（2021）提出，已突破次生性概念的局限，发展为解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核心分析框架。其本质指向执政党通过意识形态建构、组织网络渗透与政治权威辐射等，实现政治意志自上而下制度化传导的动态过程。

在社会治理研究领域，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使研究焦点往往局限于国家与社会的唯二主体，刻意回避或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地位，^[8]此种认知缺陷和理论遮蔽源自其预设的“去中心化”价值取向与我国“中心激活”治理逻辑的深层抵牾，而政治势能说之卓见恰在于构建起彰显政党轴心引领作

用的“政党—国家—社会”互动性分析框架。

2. 行政发包：弹性边界的动态重构

行政发包制在跨域治理场域中的制度演进，显示了中国治理体系独特的弹性边界重构逻辑——中央政府通过战略性保留“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的三维控制权立刚性目标框架。^[9]地方政府借自主空间行弹性执行，本质上体现了“政治统合”与“行政分权”的辩证统一（图1）。此种“控制权结构性让渡—自主权策略性激活”的协同机制，既避传统治理“刚性约束失灵”之虞，又解“弹性空间失序”之忧，形成制度弹性框架下的央地治理稳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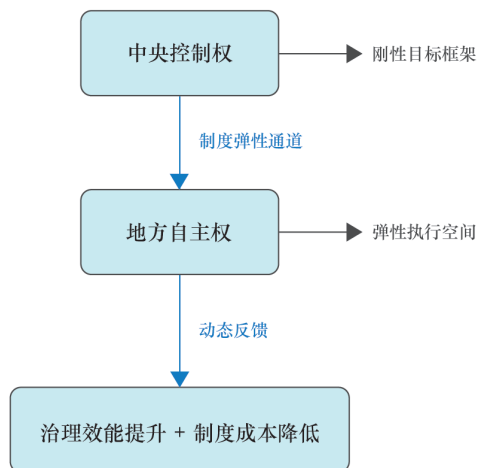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弹性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 群众路线：治理技艺的古今熔铸

技术治理之整合逻辑，实现群众路线现代转译——依托“数据画像—需求预测—资源预置”的智能链路，突破传统治理时空之囿，将共同体的空间从实体场域拓展至虚拟场域，把离散的个体诉求转化为系统性的治理议程，形塑技术与治道在社会整合层面之辩证统一。传统治理资源的社会凝聚作用则彰显了群众路线的文化基因——通过继承发展“民本思想”等古训以及唤醒乡土社会情缘，构筑“文化记忆—社会资本—共同体认同”之链，形成深植文化自觉的社会整合路径。

群众路线之创见，体现在架构起社会整合

的“技术—传统”互构逻辑：技术治理借由数据流重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转译借助文化基因巩固价值共识。如是既能防范技术治理的理性僭越，又突破传统共同体的空间局限，形成兼具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底色的治理范式。

（三）本土化分析框架的生成

承前所述，本研究提出“政治势能—制度弹性—社会整合”三维分析框架（表1），表明当代中国治理共同体乃政党主导之能动性建构产物，具体表现为：治理权威凝聚于中心（政党引领）、制度边界的功能化重构（制度弹性）、共同体的协同共治（社会整合）。此框架之创见，在于将制度分析发展框架与中国政治势能理论熔于一炉，铸就具有解释力的分析范式。

表1 “政治势能—制度弹性—社会整合”三维分析框架

分析维度	西方理论范式	中国实践创新	核心机制
政治势能	社会契约论	政党势能驱动	高位推动—督查反馈机制
制度弹性	多中心治理理论	行政发包制转型	目标刚性—手段弹性
社会整合	社会资本理论	群众路线转译	数字赋能—传统治理智慧

该框架尤擅解西方理论难窥之“中国治理之谜”，即中国何以能保持政治统一性的同时包容治理的多样性。观照长三角一体化治理实践，政治势能确保战略统一性

（设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制度弹性容纳地方多样性（推出若干项跨省通办事项清单），社会整合培育区域共同体认同（成立G60科创走廊产学研联盟），三者的协同破解了“统则僵、放则乱”的传统治理难题。

上述本土化理论框架的搭建，不仅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为解构西方经典理论

的解释困境提供了分析工具，挣脱“以西释中”之窠臼，更直指现实叩问——中国跨域治理如何实现理论生命力向实践动能的转化？这要求我们探赜索隐，凝练概念内核，搭建起理论与现实对话之津梁。

三、概念提出：“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亦为建构新型城市治理形态提供了政治势能。本文基于对治理理论与共同体理论内生契合关系的学理发现，以及中国跨域治理实践中涌现的制度创新，提出“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概念。

（一）生成逻辑

本文注意到治理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的内生契合性关系（图2）。“公共的善”作为两种理论交汇之渊薮，体现了价值层面的天然契合之妙。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建立的。”^[10]共同体是实现共同善的组织形式，共同体成员通过合作互助来维护和实现共同善。共同体理论始终以“共同福祉”为价值内核。现代治理理论强调“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11]公共治理始终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价值同源性为理论嵌合奠定了哲学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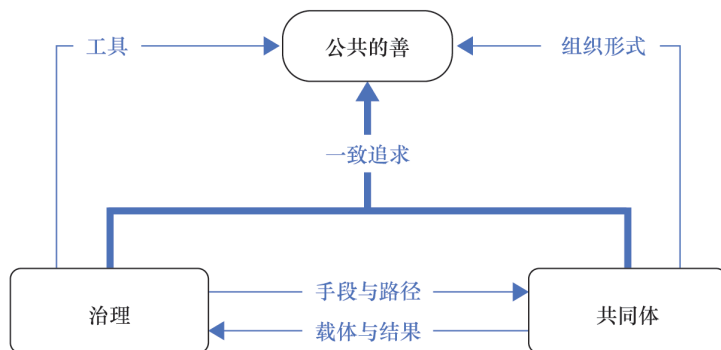


图2 治理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的内生契合性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细究其理，治理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和路径，必须借助有效治理，才能在个体化社会基础上形成稳定的共同体。^[12]畴昔先民因土田所囿、器用未精，必须仰赖集体庇护方能存活，由此催生了传统的共同体形态。步入现代社会，个体独立生存能力提升，共同体的形成更多源于个体的主观选择与积极行动，而这种“主观选择与行动”实质上就是“治理”，现代共同体的形塑离不开人为的治理行动。此外，共同体是治理的载体与结果，同时又和治理形成协同关系，共同服务于对共同善的追寻。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以共同善为价值引领、治理与共同体理论相互支撑的内生契合体系。

由是，本文提出“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其生成遵循实践驱动与理论演进双重逻辑（图3）。实践驱动逻辑以跨域治理中的现实难题为切入起点，实践困局催生治道精进之理路。理论演进层面基于治理理论与共同体理论的嵌合，彰显了理论体系自我更新的内驱力。上述两大逻辑在“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概念处形成交汇，既纾现实沉疴，复拓理脉新境，最终构建起“问题导向—理论供给—治理实践”的良性循环系统。

（二）概念界定

“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概念实质上是空间政治学理论与中华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融合，其核心内涵可界定为：依托“政党—国家—社会”三维互动结构，以执政党政治势能为核心驱动，基于制度弹性机制的动态调适与社会整合机制的基础支撑，突破传统行政区划

之桎梏与职能分割之藩篱，织就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网络，实现资源融通、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跨域治理新范式。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应对“大城市群”“都市圈”等新空间形态复杂治理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等理论的本土化回应。

观其要义，概念内核包含三个递进层次：首先，在治理场域层面，“跨域性”呈现多维解构特征。作为新型治理单元的空间载体，“域”是一种整合的“域”，形成涵盖跨行政区域、跨职能部门、跨治理层级、跨政策领域的复合型治理空间。这种空间重构既是对科层制治理“碎片化”困境的回应，也体现了网络化治理理论中“去边界化”的实践转向。其次，“共同体”的本质属性突出制度性联结与情感性认同的双重耦合，既借科层制重构形成权责配置的制度框架，复凭文脉赓续形塑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实现“硬制度”与“软文化”的有机结合。最后，在中国场景下的特殊规定性呈现为鲜明的政党引领特征，通过政治势能转化机制消解行政壁垒，实现跨域协同。当下我国跨域治理合作机制的达成主要受到属地化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化因素制约，纵向行政主导与高位政治推动仍是实现跨域协同的现实路径选择，^[13]这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本文提出的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概念，实彰中国城市治理从“单一城市竞争”向“区域协同共生”转型趋势。其价值在于，通过空间治理单元重组、多元治理主体扩容、数字技术的嵌入和赋能，推动城市治理从机械的“物理整合”走向效能指数级增长的质变，最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然则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之营建，非纸上雕龙可竟全功，更亟需解密现实机制层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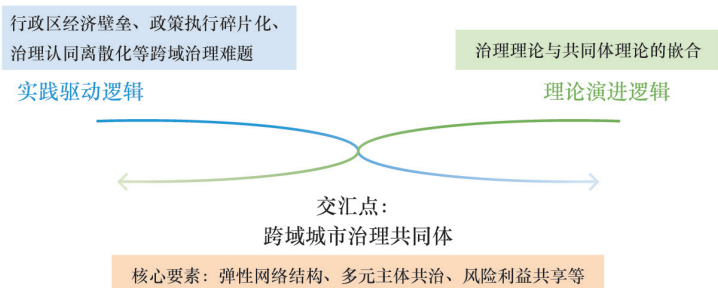


图3 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概念生成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下文将研究视角从静态概念分析转向动态过程解剖，并通过对实践案例的观察把握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从而达到理实相通。

四、机制耦合：“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场景下的跨域城市治理呈现出独特的机制耦合规律，形成“政治势能驱动—制度弹性调适—社会整合固基”系统，以动态交互方式实现治理权威的垂直穿透、资源整合的横向协同、社会认同的纵深凝聚。

（一）政治势能的制度转化机制

政治势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跨域治理的珍贵治理资源。中西方在处理跨域公共事务时，由于受权力体制架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地方治理情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于工具的选择存在偏好差异。对中国而言，有时必须利用“政治势能”这一政策工具克服跨层级、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难题。^[14]

类似于物理学中“势能—动能”的转化原理，^[15]政治势能是制度体系内蕴藏的“治理潜能”，其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具有非直接性特征，其积聚和释放需要历经一个过程。本文创新性提出政治势能转化模型（图4）。

势能储备如筑堰蓄洪，借中央权威为砥柱，铸就具有政治统摄性的势能积蓄池：以党内法规体系等为载体，化政治意图为律令圭臬，形成治理能量的初始积淀；继而进入势能传导阶段，凭党政联合发文“穿衙破署”，实现垂直贯通，突破科层壁垒；借跨部门联席会议“融通百司”，促进横向资源整合；辅以文件规格分级形成的政治信号标尺为“烽燧之示”，精准调控地方执行序列；最终在势能落地阶段形成“监督—考核—激励”三位一体之闭环系统：监督层面依托环保督察之剑悬构建问责压力链，考核体系化无形为有形，将抽象政治任务转为量化指标，实现治理过程可视化；激励层面运用锦标赛式排名以彰勋绩，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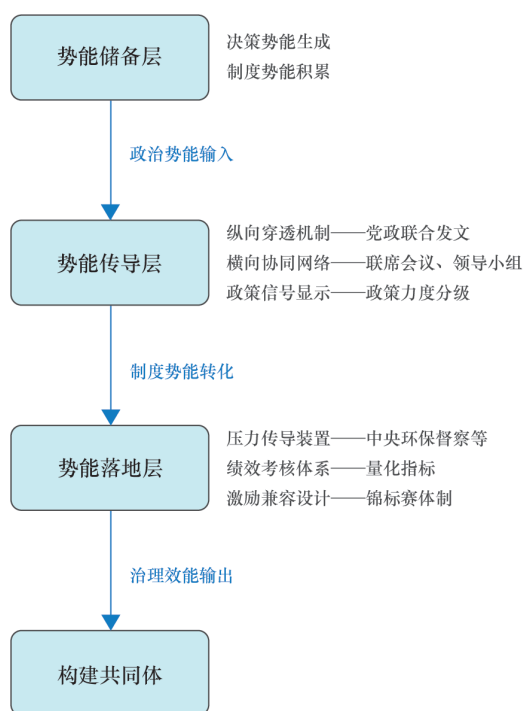


图4 政治势能转化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贺东航政治势能相关理论绘制。

以资源倾斜等激励杠杆，提振基层创新氛围。此“储备—传导—落地”三阶过程，诠释了政治势能化育为治理效能的妙谛。

然月满则亏，政治势能过刚易折，其弊有三：其一，顶层设计的宏观统摄性与地方执行的微观适配性存在制度间隙：蕴涵政治势能的政策文本往往重宏观规划、整体设计，但操作性和专业性细节描述较少。其二，纵向传导的强信号特征抑制横向协商空间：高政治势能的公共政策往往被理解为“上级制定、下级执行”，造成上下级政策交流不足，缺乏实践性，高政治势能的政策在地方执行中缺乏因地制宜的转化，地方自主性难以发挥，^[16]跨域治理项目中地方自主创新贡献度低。其三，运动式治理的脉冲效应导致常规治理效能衰减：频繁运用高政治势能的运动式治理，会忽视或替代国家体制中的常规型治理，^[17]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很难实现长效的治理绩效。

制度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一

个国家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础。^[18]在新时代，应重视政治势能的制度化，主动优化规则设计，方得长治久安。欲解政策刚性与地方实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需构建张弛有度的制度弹性机制，刚柔并济，通过动态调适降低系统冲突风险，实现治理生态的适应性平衡。

（二）制度弹性的动态调适机制

中国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仅需要政治势能的纵向穿透，也需要制度安排在刚性约束与柔性调适间达成动态平衡。制度弹性的核心体现为制度框架的灵活性与韧性，既非机械的僵化保守，亦非无原则无底线的妥协，而是在两者间寻得均衡状态。制度弹性调适机制通过构建“吸收层—调适层—转化层”的嵌套结构（图5），在政策刚性目标与地方情境张力之间搭建缓冲带。

吸收层通过预设制度空白吸纳外界冲击，化刚劲于无形，起到缓冲带的作用，借助政策试验的弹性空间，实现对多元化利益诉求博弈的容纳，恰似围棋留眼，在维护中央权威稳定

性的同时又许地方妙手，为地方预留创新的可能性。调适层通过构建“监测—反馈—修正”循环装置，在制度刚性与实践柔性之间架设转换中枢。以长三角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水质对赌协议”为例，其通过设置污染物浓度浮动阈值，将刚性指标转化为弹性激励机制，驱动上下游城市形成治污协作共同体。转化层作为制度跃迁的创新触发按钮，俟调适层的量变积至临界，将地方经验提炼、升华、固化为可推广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这三层结构的协同运作，揭示了中国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中制度弹性的动态调适机制运行逻辑：吸收层化解冲击的破坏性能量，化刚劲为绕指柔；调适层将外界扰动转化为动力；转化层最终促成治理范式的创新跃迁。这种弹性机制在保持中央权威韧性的同时，借助“渐进式制度演进”释放地方创新生命力，尽显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智慧。

（三）社会整合的协同共治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分化与整合的社会，分化与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双重逻辑。社会整合在时间上晚于社会分化，^[19]与具有自然驱动力的“分化模式”相比，社会整合更需要人们及时的经验总结与主观构想。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结构的不断整合，良好的整合机制是促进社会结构健全分化的保证。^[20]当社会领域和价值分化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价值危机愈演愈烈时，社会整合的诉求也就凸显出来。^[21]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整合理论，自一开始就背负着应对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分化的使命，社会整合的研究就是为了回应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断裂”问题。^[22]

社会整合是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本身性质所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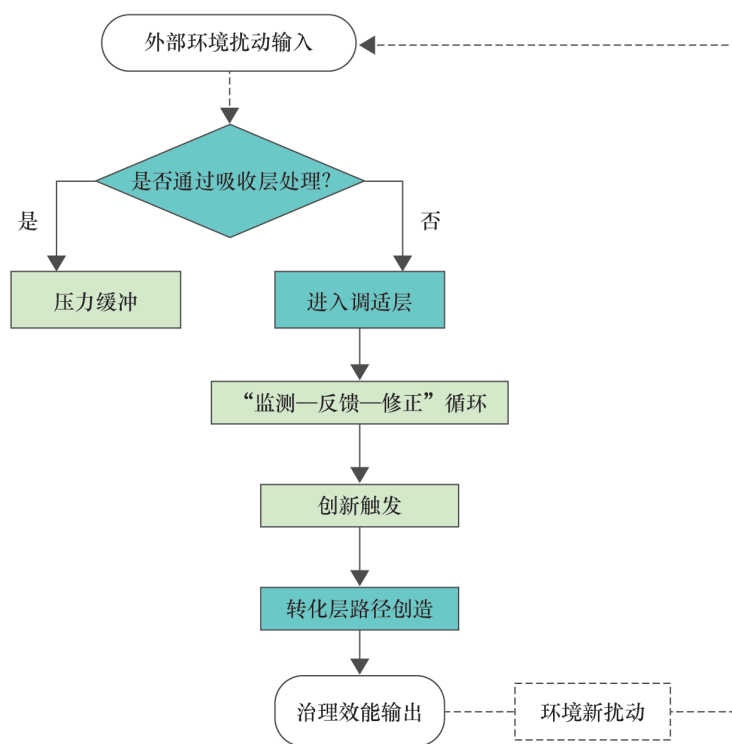


图5 制度弹性动态调适模型

的，没有它，社会就无法构成一个统一体。^[23] 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生命力源自多元主体在价值、利益与技术维度的有机协同，这种协同既非简单的利益妥协，亦非单向的权力吸纳，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构建“价值共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治理生态，将分散的治理资源转化为协同共治的集体行动能力，为治理效能落地提供社会基础支撑。社会整合的协同共治机制依托“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复合治理结构（图6），^[24]在“政治势能驱动—制度弹性支撑”的框架下，形成社会能量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闭环通道，实现跨域治理从“物理整合”到“化学反应”的质变跃升。

改革经年，中国城市治理逐鹿于效速之途，加剧了社会身份区隔、文化分异与阶层壁垒诸症，陷入道德性困境。^[25]当下，培育价值性共同体尤显紧要。价值协同机制重续文脉，唤醒和创造性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将之与现代治道理念融合，形成共振，夯实共同体的深层认同基底。典型案例如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共举“流域治理伦理共识行动”，融“天人合一”传统生态观与“流域共治”现代理念于一体，既规避并消解了制度刚性可能引致的文化冲突，又为政治势能的落地设置柔性界面。

利益整合机制着力于构建跨域治理的激励相容框架，化解行政区经济引发的利益碎片

化格局。例如，川渝两地在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通过“碳汇交易额折算”将生态保护成本转化为市场权益，助推形成绿色发展共同体。此举非但破零和棋局之窠臼，更彰共同体利责同担之要义。

技术赋能机制依托数字技术重构社会参与渠道，以虚拟社交替代实体互动，打造虚实交互的协同治理平台。例如，杭州“城市大脑”研发的跨域治理数字孪生系统，既接入长三角江浙沪皖三省一市政务数据中枢，又开万民参与之门户。该机制不仅强化了制度弹性的调适效能，也通过数据流重塑了共同体的治权经纬。

社会整合协同机制的独特价值在于构建起跨域治理的“第三空间”——既非纯粹的政治权威支配领域，亦非完全的市场化交易场域，而是通过制度化协商渠道将多元主体纳入治理能量转化链条。当政治势能通过制度弹性完成纵向穿透与横向调适后，社会整合机制最终将治理动能转化为可持续的集体行动能力，实现“自上而下制度优势”与“自下而上社会创新”的有机统一。

（四）机制耦合的协同演进：中国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

三大机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彼此交互、动态耦合的协同演进关系：政治势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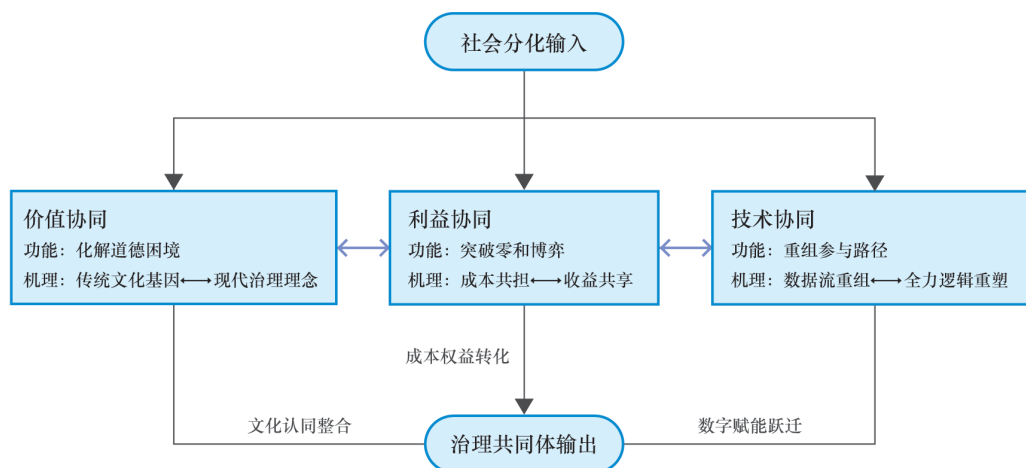


图6 社会整合的协同共治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跨区域治理提供垂直纵深的驱动力，制度弹性提供政策调试的缓冲区间，社会整合则为治理共同体的营造奠定群众基础。三重机制的动态耦合构建了中国跨区域城市治理共同体。观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之蝶变，其显示出较为明晰的阶段性特征：2014—2017年为“政治势能主导期”，中枢擘画如盘古挥斧，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指导完成了制度框架的初步构建；2018—2020年进入“制度弹性调适期”，雄安试验若女娲炼石，雄安新区作为“政策实验室”，承担了跨区域治理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和调整任务；而自2021年起的“社会整合深化期”，“疏解促提升”专项行动似大禹导洪，进一步激发了市场等多元主体的活力。“政治势能引领—制度弹性调节—社会整合响应”三重机制循环相生，既承五千年治道精髓，又开新时代城治新章，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跨区域城市治理共同体。

五、结语

本文立足中国城市治理场景，通过理论重构、概念创新与机制耦合的多重探索，揭示了跨区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构建逻辑。

其一，建构“政治势能—制度弹性—社会整合”三维分析框架，突破西方治理理论的解释窠臼，为中国特色的跨区域治理提供本土化理论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重大理论观点，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分析框架既立足中国实际，承马克思主义真髓，又汲取华夏文脉精粹；既延续治理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的学理脉络，又创新性地融入中国“党政统合”的制度基因，为城市治理知识体系注入中国治理智慧。

其二，提出“跨区域城市治理共同体”概念，其作为中观分析单元，弥合全球治理宏论与社区治理微观研究之间的理论断点。此概念是对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的重重鼎革：首先，体现在治理层级方面，突破属地管理原则对传

统城市治理体系的禁锢，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导向，强调空间联动性。其次，体现在治理要素方面，强调对治理资源的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实现整体效能的提升。此外，还体现在治理技术层面，依托数字技术搭建跨域协作平台，实现应急管理、交通调度等场景的实时协同。因而，此等创见实为城治新制辟康庄。

其三，揭示三维机制耦合的动态规律，阐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跨区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依托政治势能的制度转化实现治理权威再生产，借助制度弹性的动态调适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通过社会整合的协同共治重构治理合法性基础。同时，在探索实现机制时，本文聚焦的长三角生态补偿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等治道活典，也为破解行政区经济困局、推进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新形态，^[26]恰似开辟鸿蒙。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产物，跨区域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既是应对治理碎片化的制度创新，更是重塑国家—社会关系的治理革命。这种治理范式的创新，不仅为超大规模国家的空间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转化架设理路云梯。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
- [2] 武俊伟, 孙柏瑛. 我国跨区域治理研究: 生成逻辑、机制及路径[J]. 行政论坛, 2019, 26(1): 65-72.
- [3] 锁利铭, 阚艳秋, 涂易梅. 从“府际合作”走向“制度性集体行动”: 协作性区域治理的研究述评[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8, 7(3): 83-96.
- [4] 韩万渠, 李丹阳. 调查研究、协商吸纳与渐进调适: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中层机制[J]. 科学社会主义, 2022(2): 115-122.
- [5] 杨涛. 治理型政党与政党权威的再生产——以南京鼓楼区华侨路街道为例[J]. 西南交通

-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3(5): 93-98.
- [6] [14] [16] 贺东航, 孔繁斌.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4): 4-25+204.
- [7] 温美程, 黄六招. 政治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例[J]. 岳麓公共治理, 2024, 3(2): 31-42.
- [8] 贺东航, 高佳红. 政治势能: 党的全面领导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分析框架[J]. 治理研究, 2021, 37(5): 79-85.
- [9] 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J]. 社会, 2014, 34(6): 1-38.
- [10]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选集: 政治学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 [11] 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5): 37-41.
- [12] 徐勇. 无治理不成共同体: 政治学的视角[J]. 理论学刊, 2024(4): 84-92.
- [13] 武俊伟, 孙柏瑛. 我国跨区域治理研究: 生成逻辑、机制及路径[J]. 行政论坛, 2019, 26(1): 65-72
- [15] [17] 贺东航, 孔繁斌. 重大公共政策“政治势能”优劣利弊分析——兼论“政治势能”研究的拓展[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0, 9(4): 52-59.
- [18] 贺东航, 吕鸿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势能[J]. 东南学术, 2019(6): 1-11+246.
- [19] [22] 吴晓林. 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国外研究的考察[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2): 37-46.
- [20] 殷京生. 中国城市社会整合模式的变迁: 从单一行政性社会整合到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J]. 南京社会科学, 2000(11): 45-50.
- [21] 王虎学, 万资姿. 分化与整合: 现代社会的哲学诠释[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6(4): 12-16.
- [23] 程竹汝.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J]. 学习与探索, 1999(5): 83-89.
- [24] 王浦劬.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3): 11-17.
- [25] 吴晓凯, 文军. 整体性治理: 中国城市治理形态的逻辑转型及其实践反思[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0(4): 64-70.
- [26] 徐勇, 李华胤. 现代社会、社会治理的“共同性”构建与实践探索——兼论微观场域中的“共同缔造”[J]. 政治学研究, 2024(5): 44-54+164-165..

How Can a Cross-Domain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y Be Constructed?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and Mechanism Coupling Based on the Chinese Context

Fang Yuwe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Rooted in China's unique governance contex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ross-domain governance and the dilemmas of mega-city governance,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adaptive pathways for urban governance systems.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litical energy,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t proposes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a "cross-domain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y," emphasizing the reliance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on structure of "party-state-society." With the political energy of the ruling party as the core driver and dynamic adapt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mechanisms as the foundational support of soci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it aims to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for cross-domain governanc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political energy drives governance efficacy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reservoir-conduction-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balances policy rigidity and local innovation via a nested structure of "absorption layer-adaptation layer-transformation layer," while social integration fosters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cosystem through shared values, mutual interests,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Drawing on regional case studies such a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t demonstrates the critical role of mechanism coupling in overcom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arriers and advancing governanc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The paper seek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Chinese urban governance theory system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ross-domain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energy; mechanism coupling

■责任编辑：王明洲